

袁 鷹著

于伶傳

• Yuling zhuan



長

CHANG

夜

YE

行

XING

人

REN

序 一

夏衍

我同于伶同志最初相识是在 1933 年 3 月他从北平调到上海左翼剧联工作之时，至今已近六十个年头了。他一生几个重要时期，除去早期剧联北平分盟那两年我不清楚以外，其余在上海、香港、重庆和抗战胜利后及解放后的上海，这几段，我都同他在一起，或长或短。患难相依，甘苦与共，是老朋友、老伙伴、老战友了。再过两三个月，他就满八十五周岁，我则已过九十，都已到垂暮之年。然而回首前尘影事，六十年陈迹依然历历在目。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戏剧运动，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他奉命于危难之际，带领一批同志坚持“孤岛”的戏剧岗位，苦斗四年；“皖南事变”后撤退到香港；太平洋战起，香港沦陷，他经东江游击区转到桂林；后来又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到重庆继续从事戏剧运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工作了三年，国共和谈破裂，他又经香港到北平，参加南下大军，接管上海文化事业，并且不遗余力地参加创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1955 年以后，风云突起，我们两人都被“潘汉年冤案”株连。我因为已调到北京中央文化

部，写个材料就算完事；他在上海则遭到柯庆施、张春桥一帮人的打击，“罢官”靠边十年之久。“文革”中，又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坐了九年监狱，受尽摧残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他平反，尽管老骥伏枥，尚有千里壮志，但毕竟无复有当年的精力和豪气了。风风雨雨，平白地使一位有抱负、有能力、有才华的党员戏剧家，闲白了少年头！

我一直以为，于伶与其说是一位硕果累累的剧作家，毋宁说是一位毕生献身于革命文艺运动的老战士、组织家和社会活动家。很多时候，他充当幕后人物、无名英雄的角色。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戏剧运动是很艰难也很辛苦的，党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拿出多少钱做文艺事业的经费。搞话剧更是既赔钱又受气，还要冒坐牢杀头的危险。而于伶总是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将许多杂事都担当起来。他工作出色，尤善于“打乱仗”。他又能广泛地同文化界许多上层人士、著名的戏剧家、电影家、教授学者以及社会名流打交道、交朋友，取得他们的帮助，将他们吸引和团结到革命、进步的旗帜下，成为共产党的知心朋友。二三十年间，在生活和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可信赖的、可爱的戏剧电影队伍。在这些方面，于伶的贡献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要发展，永远需要一大批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任劳任怨、不尚空谈的实干家，也永远需要能以平等态度待人、能以身作则、甘于作幕后人物和无名英雄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作为骨干，任何事业都不会成功。

于伶的一生，伴随着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以至整个革命运动从艰难创业到发展壮大的坎坷曲折的历程。他同我们这一

代知识分子一样，经受了几十年风霜雷电、血火刀兵的考验。流过汗，流过泪；追求过，挣扎过，痛苦过，欢乐过。然而，他们上下求索，九死不悔，始终朝着既定的目标迈出坚实的步伐。1941年7月，我在香港写过一篇《于伶小论》，开头说：“一闭上眼，仿佛可以看见一条漫长而险阻的道路上，一个怯弱、可又是那么悲壮的求真和求美者的姿态。颤颤、挫跌、无情的嘲笑、一时的迷失，荆棘刺伤他的肌肤，崎岖磨损他的脚底！可是他摸索着，行进，没有丝毫的反悔。”那是刚刚进入中年的于伶形象。三年后在重庆，郭沫若同志赠他诗中有一句：“长夜行人路不迷”。可以说是于伶一生的写照了。

十年前，《于伶戏剧电影散论》出版时，我说过这样几句话：“我没有调查过，现在三四十岁的戏剧工作者中间，有多少人知道王国维、焦循；有多少人知道欧阳予倩、洪深；有多少人知道春柳社、南国社？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不知是不是也可以说：忘记或者不想了解祖国历史，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懂或者不想懂中国现代戏剧史，不了解二三十年代、抗战时期、‘孤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业余剧人’（当时，除了极少数国民党办的剧团之外，戏剧界几乎全是‘业余剧人’）的艰苦，要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国戏剧的传统和风气，我看也是困难的。”现在，我想再补充几句：今天的戏剧电影工作者，有多少人知道田汉、阿英、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应云卫、赵铭彝、陈鲤庭、石凌鹤、王尘无、陈白尘……（其中一半以上已先后作古）的战绩呢？没有他们的血汗，披荆斩棘，开辟蒿莱，何来我们的今天？我们在开拓新的路程走向未来时，怎能忘记或者不了解前人的脚印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支持《长夜行人·于伶传》的写作和出版。这不只是于伶一个人的传记。这里面有我们许多人的影子，也有我们许多人的笑声和泪痕。今天的戏剧电影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朋友，都需要这样的传记。本书作者袁鹰是我的一位忘年交，我最早认识他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文艺青年，在姚苏凤、冯亦代主持的《世界晨报》当编辑。上海解放后在《解放日报》，以后在北京《人民日报》，我们一直有往来，如今他也是鬓发苍苍、渐入老境了。他写这本书以前，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一开始表示支持。我还说过：写于伶的重点，应该放在“孤岛”时期和解放初期这两段。看来，他是接受了我的意见的。

我五十年前的那篇《于伶小论》，是在香港那特殊的环境中写的，本有许多言不尽意之处，多年来却常常被研究中国戏剧史和评论于伶剧作的朋友们所引用，使我常感歉疚。于伶和袁鹰都不止一次对我说：“那么你就再写一篇‘大论’如何？”从道理和私交上说，似乎都责无旁贷。但以我目前的体力和视力，已经力不从心，写“大论”谈何容易！如今只能趁于伶传出版的机会，写上几句比“小论”还要“小”的话，想来于伶和作者都能予以谅解的吧？遥望江南，不尽依依。

1991年寒冬于北京

序 二

荒 煤

这是我去冬患病后拜读的第一部作品——袁鹰同志所写的《长夜行人·于伶传》。

我衷心感谢在散文家袁鹰的笔下充满激情地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位“长夜行人”，还着重刻画了那个时代的个性和心态。这种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经艰辛，披荆斩棘，开拓道路，度过了多少漫漫长夜的“长夜行人”还有几位？！

从 1929 年到 1930 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伟大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现在已经整整过去近 65 个年头了。在这几十年中，我们不仅输送了大批文艺工作者到延安、到各个抗日根据地去，我们还在大后方广交朋友，广泛团结文化界的名流，积极发现和培育新人，经过不断的斗争和实践，终于形成了一支坚强战斗的、可信赖、可爱的戏剧电影队伍。在新中国建立后，这支队伍又成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奠基人和骨干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正如夏衍同志 1991 年冬就鼓励《于伶传》的写作并写下

序言中所讲的：

“今天的戏剧电影工作者，有多少人知道田汉、河莫、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应云卫、赵铭彝、陈鲤庭、石凌鹤、王尘无、陈白尘……（其中一半以上已先后作古）的战绩呢？……何来我们的今天？我们在开拓新的路程走向未来时，怎能忘记或者不了解前人的脚印呢？”

而今，夏衍同志也终于和我们长别了，他的《懒寻旧梦寻》续篇未能完成，也终于使我们遗憾地不能看到他实事求是地自我审视、深刻反思建国以来饱经坎坷的经历了。尽管根据夏衍的著作和经历，已经有人或者还有人会写成《夏衍传》，可是缺少夏衍自己的反思，终究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痛心的遗憾。

从这一点来讲，袁鹰所写的《长夜行人·于伶传》就有一个可喜的际遇。于伶尽管年近九旬，记忆却还清晰，他又是一位诗人，几十年来以至在 9 年监狱生活中还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心迹。更可喜的，潘汉年 27 年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虽然“文革”一场浩劫之中，即令林彪、江青一伙极尽其能事妄图以 30 年代到 60 年代的“一条反革命文艺黑线”的罪名，把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艺活动以至建国以来的文艺活动一律加以抹杀，恨不得把这些人物全都置于死地，但他们却终于把自己送上审判台！

可以这样说，倘若潘汉年的冤案不能平反，于伶的历史也无法真正澄清，他的冤案也难于真正平反。《于伶传》写到于伶听到潘案平反后的种种心情，他写下感人至深的诗句，尤其是写到 1982 年，由上海市委通知，去执行党中央交办的任务，到湖南迎回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盒送到八宝山公墓安葬

的这些情节和文字，不能不令我热泪盈眶！

也直到此刻，我回忆起郭沫若 1944 年 2 月 23 日赠给于伶的那首诗，不能不感到万分感慨！诗曰：“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

这不仅是对于伶在上海“孤岛”和重庆时期几部剧作的赞扬，也是对年方 37 岁风华正茂的于伶的鼓励。这首诗也许是我牵强的联想，难道不也是于伶终生的写照么？他一生为中国革命戏剧电影执著战斗的精神，创作之丰富、鞠躬尽瘁作为一个真正的幕后人，组织了许多声势浩大、震撼一时的演出，从抗战前的北平、上海到“孤岛”时期，抗战中的重庆时期，又重返解放后的上海，在戏剧电影两栖之间同时作战，难道不就是写下了一部中国戏剧电影运动富有传奇性的“英烈传”么？他受“潘杨冤案”株连冤屈达 10 年之久，仍以坦荡的胸怀创作了《聂耳》、《七月流火》，不正是说明这位经过漫漫长夜考验的行人始终“路不迷”的豪情壮志么？身陷囹圄 9 年之后重返上海，尽管至今已是春雨江南八九度了，我却真地还期望他再“如花溅泪发新枝”哩。但愿这不是我的奢望！

我真诚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传记作品。我认为，它不仅是于伶个人的传记，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生动真实地描绘了中国革命戏剧与电影运动发展的一部历史，展现了许多先烈和前辈艰苦创业的作风和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榜样。何况，抗战时期，建国以来，许多生动的事例，都证明：戏剧电影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莫不与周恩来始终如一的热情关怀和指导息息相关。这也就增加了回忆这段历史的时代感、真实感和亲切感！周恩来已经远别了我们，然而他作

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为革命文艺工作者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崇高的品德，都是我们永远无法忘却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觉得，每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来读一下这本传记。

目 次

序一.....	夏衍
序二.....	荒煤
第一章 古都寻圣火	
一、海天寥廓立多时	1
二、危楼苦读人	8
三、江南旧梦	14
四、“左联”新战士	22
五、戏剧一小兵	27
六、呵莽！芭莉芭！	33
七、加入党的队伍	40
八、初次见鲁迅先生	46
第二章 泥泞中作战	
九、风雪南归路	53
十、“33315”之夜	59
十一、怒向刀丛	67
十二、笔战强权	74
十三、走进大剧场	81
十四、“国防戏剧专家”.....	87

十五、“一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起来呀！”····· 97

十六、慷慨悲歌上战场 ······ 105

第三章 舞台深处筑心防

十七、寒宵壮别 ······ 113

十八、奉命危难间 ······ 123

十九、从尤兢到于伶 ······ 130

二十、此时此地 ······ 139

二十一、同是夜上海中人 ······ 148

二十二、风雨听鸡鸣 ······ 157

二十三、烈士血，志士心 ······ 163

二十四、“孤岛”不孤 ······ 172

二十五、知友情深 ······ 182

二十六、怀着离愁而去 ······ 188

第四章 天涯羁旅

二十七、香港脱险 ······ 198

二十八、在东江游击区 ······ 207

二十九、漓江畔的乡愁 ······ 213

三十、重庆多雾，也有阳光 ······ 218

三十一、杏花春雨情思 ······ 227

三十二、长夜行人路不迷 ······ 233

第五章 团结战斗，迎接黎明

三十三、青春作伴好还乡 ······ 242

三十四、荒唐的梦和血淋淋的现实 ······ 250

三十五、周恩来的嘱咐 ······ 259

三十六、“全民迫死生”的日子 ······ 266

三十七、“有事就去找于伶先生”	273
三十八、又一次暂别	281
第六章 艳阳天、风雨天	
三十九、穿军装走上南京路	290
四十、接管和会师	296
四十一、让电影回到人民手中	302
四十二、第一场风暴	310
四十三、晴转多云，多云转阴	318
四十四、潘汉年是“内奸”！？	324
第七章 十年面壁，十年迷雾	
四十五、梦到新华门	335
四十六、我欲吹箫赋《大招》	340
四十七、《聂耳》之歌	345
四十八、《七月流火》前前后后	355
四十九、暖流和寒雨	366
五十、小楼昨夜又西风	376
第八章 秦城铁窗岁月	
五十一、秘密逮捕，十次抄家	388
五十二、秦城白杨噪暮鸦	399
五十三、囚室里的歌吟	408
五十四、狱中玫瑰	415
五十五、蓝苹这个女人	419
五十六、我欲乘风归去	427
五十七、归吟种种	434
五十八、小榕树抒情曲	440

第九章 思南路哀思无极	
五十九、一项未及完成的任务	446
六十、万里外的关怀	449
六十一、曾家岩夜谈	454
六十二、“没有生活积累怎么写”	457
六十三、殷殷垂注	460
六十四、铁窗无那又黄昏	469
第十章 有歌有哭，也有沉思	
六十五、一路鱼龙一路歌	473
六十六、抒写不尽的哀思	481
六十七、泪洒湘江	490
六十八、老骥不伏枥	496
六十九、回首当年，温故知新	501
七十、从老于到“老迂”	507
后记	514
主要参考书籍和文章篇目	519

第一章 古都寻圣火

一、海天寥廓立多时

1930年夏季的一天。

黄海海面上，乌云滚滚，狂风阵阵，浊浪滔滔。一艘从上海开出的轮船艰难地向北航行。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悄悄走出水手舱，登上甲板，凭倚船舷，伸开双臂，长长地舒一口气。瘦长文静的身躯，显得有点弱不禁风，此刻却似乎增添一些英气。

平生第一回乘海轮，头晕目眩，不时呕吐，那滋味，同太湖畔的夜航船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以前由家乡宜兴到苏州上学，快班船在河汊里缓缓航行，两岸青山绿水，灰砖白墙，竹林茅舍，河埠石桥，一路饱览江南水乡景色。过太湖时，三万六

千顷风帆沙鸟，更使人心旷神怡，哪像这般颠簸晃荡呢？若不是蒋介石阎锡山中原大战，陇海路和津浦路中断，他怎么也不会绕道上海，买一张去天津的五等舱船票，又向一个好心的宁波水手租个铺位，挤上这艘又闷又热的海轮。昨天一整天，闷坐在水手舱里，心里又急又烦。晕船事小，万一到北平误了国立大学考期，对他这个清寒学子来说，岂不是件糟糕事？

好不容易睡了一夜，今天一早，那位宁波水手劝他：

“任先生，你到甲板上透透气去，莫闷出毛病来。吹吹风，头就不晕了。”

这位年轻的任先生，叫任禹成。1907年2月23日（光绪丁未年正月十一日）他在江苏宜兴南乡叫薛家桥的小山村呱呱堕地时，正是腐朽的清王朝濒临末世。父亲仍然希冀儿子长大能有所作为，就从《书经·禹贡》篇“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两句中撷取四个字为儿子作名号，锡圭为名，禹成为字。儿子长大入学时，觉得锡圭两字难读，就改用禹成作名字。

果然，走上甲板，胸襟顿时为之一爽。尽管轮船还在海浪里颠簸喘息，但是纵目四望，无边无际，毕竟空阔多了。

苍茫的黄海上，常是雨暴风狂，怒涛汹涌，很少遇到海天一色、沙鸥翔集的美景。渤海湾外，辽东半岛那一带海域，一百年来更是许多爱国志士的伤心地。那些乘海轮北上京津、南下苏浙、东渡扶桑、西归华夏的热血儿女，在甲板上遥望大东沟、刘公岛，缅怀甲午海战中国水师的壮烈战绩；经过胶州湾，看到德国军舰耀武扬威；远眺旅顺口，想起日俄两强竟将中国大好河山作为角逐场；谁能不抚舷流涕，感慨万端！中

国，中国，你什么时候才能强盛起来啊！

万里乘风去复来，
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
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
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
须把乾坤力挽回！

这是 1904 年鉴湖女侠秋瑾从日本回国省亲，在黄海舟中所作诗句。任禹成今天也在黄海舟中想起这首先烈遗作，尽管时间已隔二十余年，清朝皇帝早被推下龙座，秋瑾那一腔慷慨悲歌的豪气仍使他感奋不已，而且立即联想起当年父亲在乡间听到秋瑾遇害时顿足长叹的情景。

他的父亲，满腹诗书，少有大志，很想有一番成就，可惜两次乡试，都先后由于丁忧居丧在家，失去机会，直到废除科举时，连秀才也未中。这位乡村知识分子接受了维新思想，赞成康梁变法，也支持孙中山倡导共和，对梁启超尤为倾倒。辛亥那年，武昌起事的消息传到江南，他立即进城，参与宜兴、荆溪两县的光复活动。回村时，头上的辫子已经剪掉，还兴冲冲地自己动手，革掉了四岁儿子禹成的小辫子。以后，就集资在家乡办学，请来“教习”教体育课，使他们那个地处苏浙皖三省之交本来很偏僻的山村，开了风气之先。可惜由于地方保守势

力的种种阻挠，学校没有办多久就忍痛宣告结束。任禹成只好到离村五里的私塾，坐在孔夫子牌位前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父亲对这个儿子有他自己的教育主张，送去私塾，只是让他去受点识字的启蒙课。读了《百家姓》、《千字文》略识之无以后，就亲自教他读《孟子》，读《诗经》，读《左传》、《史记》，读《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他认为塾师循旧例在识字之后读《论语》、《大学》、《中庸》，对孩子并无多大用处，所以就从“四书”中单挑出《孟子》，一是因为它有点故事情节，能引起兴趣，二是因为具有辩论色彩，能训练思维。当时正是新旧思潮冲撞变革之秋，这位老童生感慨于自己的坎坷遭际，就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好学的儿子身上。家藏的古今名著，经史子集，诗词小说，都让儿子从架上取下来自由浏览。这就使年轻的任禹成如鱼得水，纵情游弋在文学艺术的大湖中，吮吸各种各样甘醇的乳汁。以至到老来回溯平生，他总深情地说起父亲实在是自己文学道路上第一位严格而又亲切的老师。

1923年秋天，任禹成念完几年私塾和高小之后，考进了苏州草桥的江苏省立第二中学。苏州毕竟是人文荟萃之邦，比宜兴山乡开通发达多了。它邻近上海，接触新思潮快。北京、上海的刊物，一出版就能读到。“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作品，也在意气风发的中学生中广泛流传。这样，任禹成在读了龚自珍、黄遵宪和柳亚子、苏曼殊等南社诗人许多作品的同时，又读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政论、胡适的白话诗、鲁迅的《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面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书本里的天地毕竟遥远而渺茫，周围的世界，却是那么混